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9/61/Add.1
27 January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1(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酷刑和拘留问题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S·罗德利爵士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5/3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增 编 *

特别报告员对土耳其的访问

* 附件只有英文本。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7	1
一、酷刑情况：范围和背景		
A. 一般性问题.....	8 - 18	4
B. 警察站和武警站的情况.....	19 - 23	6
C. 监狱的情况.....	24 - 25	8
D. 个别案例的情况.....	26 - 28	9
二、保护被拘留者免遭酷刑		
A. 法律问题.....	29 - 52	9
B. 医疗问题.....	53 - 68	16
三、不受惩罚问题.....	69 - 98	21
四、结论和建议.....	99 - 113	27
Annex: Selected cases submitt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question of torture from 12 October to 12 December 1998		34

导 言

1. 在特别报告员的要求下，土耳其政府于 1997 年邀请特别报告员按其职权范围访问该国。访问是从 1998 年 11 月 9 日至 19 日进行的，其目的是使特别报告员能够通过广泛的接触收集第一手资料，以便更好地评估土耳其境内酷刑的情况。

2. 特别报告员在 11 月 9 日至 12 日访问安卡拉时会见了下列官员：内政部长 Kutlu Aktas 先生、司法部长 Hasan Denizkurdu 先生、卫生部长 Halil I. Ozsoy 先生、主管人权的国务部长 Hikmet Sami Türk 先生、内政部次长、外交部次长、多边政治事务司司长、内政部保安司代司长、司法部监狱和拘留所司司长；武警参谋长；安卡拉保安局局长；法官和检察官高级理事会成员；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人权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卡拉国家治安法院检察长和安卡拉检察长。

3. 11 月 13 日至 16 日，特别报告员去迪亚尔巴克尔，在那儿会见了紧急地区长官、迪亚尔巴克尔国家治安法院检察长和迪亚尔巴克尔检察官。11 月 17 日和 18 日，特别报告员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伊斯坦布尔国家治安法院检察长、伊斯坦布尔检察长、伊斯坦布尔治安主任、法医事务所所长和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医学院院长。

4. 特别报告员还访问了如下各处的拘留点：安卡拉保安局反恐怖处；迪亚尔巴克尔郊外Çınar 的武警指挥部；伊斯坦布尔保安局麻醉品处和伊斯坦布尔 Beyoğlu 的警察总局。为了向候审的囚犯询问他们在警察拘留所的待遇，特别报告员走访了安卡拉中央监狱、迪亚尔巴克尔的 E 型监狱和伊斯坦布尔的 Sağmaldılar(Bayrampasa) 监狱，并且还会见了负责官员。

5. 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迪亚尔巴克尔，特别报告员会见了据称其本人或家属曾受过酷刑的人。

6. 他从国家一级的非政府组织收到了口头和/或书面资料，这些组织包括：土耳其人权基金会(HRFT)、人权协会(IHD)、现代律师协会(CHD)、土耳其医学会(TTB)和土耳其法医学会(FA)。

7. 他还从地方一级的非政府组织收到了口头和/或书面资料，这些组织包括：在安卡拉，IHD 安卡拉分会；在迪亚尔巴克尔，HRFT 迪亚尔巴克尔分会；囚犯家属团结协会(TAYD-DER)、迪亚尔巴克尔律师协会和迪亚尔巴克尔医学会；在伊斯坦

布尔，HRFT 伊斯坦布尔分会、IHD 伊斯坦布尔分会；星期六母亲协会和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

一、酷刑情况：范围和背景

A. 一般性问题

8. 特别报告员接触的当局一致表示，在土耳其，酷刑并不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偶有发生，也并非政府所支持的。绝大多数当局认为，特别在最近几年，酷刑发生率已经减少，这等于承认以往的酷刑发生率比较高。然而，其中有些人也承认：酷刑在一方面仍然是土耳其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酷刑有时是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紧急地区长官 Aydin Arslan 先生说，以往的酷刑指控要多得多。最近指控的数量减少主要是由于恐怖主义的活动率降低，以及由于有了新的立法和加强了人员培训。

9. 与此相反，特别报告员在访问之前和访问期间从非政府来源收到大量资料中指控酷刑仍然广泛和经常发生。然而绝大多数案件没有向当局举报，主要是由于事实上很少向施用酷刑的执法官员提起法律诉讼，施用酷刑者被判有罪的情况就更少了，而在执法官员被判刑的罕见情况下，刑罚也往往比较轻。还有，在某些案例中，酷刑的受害者感到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以至于他们难以承认和谴责所遭受的酷刑。什么才算是酷刑也是有关的：往往受害者和负责调查酷刑案件的检察官都认为只有最为残暴的肉体折磨才算酷刑。本报告的附件选列了 1998 年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12 日期间非政府组织提交给特别报告员的将近 40 个案例，将根据本职权范围内的标准程序对这组案例加以总结并转交给土耳其政府。

10. 土耳其人权基金会报告，1997 年有 537 人，1998 年上半年大约有 350 人，作为酷刑的受害者向治疗和康复中心提出申请。这些数字并不代表酷刑受害者的总数，这仅代表那些熟悉康复中心工作的人或者向熟悉基金会的组织或个人提出申请的人。此外，来自土耳其南部和东南部、特别是来自紧急地区的酷刑指控数量已减少。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消息来源，这是因为人们并不十分热切于报告案件，并且大多数独立的律师和医师已经移居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因此，在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对人权情况进行任何监督。

11. 整个 1990 年代,在制订立法(见第二和第三章)和在人权教育方面取得了进展。教育措施包括:把人权课程纳入学校的教学大纲,并纳入为保安部队以及为监狱工作人员和其他公共行政人员举办的培训班的课程内。此外,在过去几年内,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在土耳其全国各地为省长、地方行政长官和保安部队举办了人权讲习班,并在 1998 年为省长和警察与武警负责人举办了两次人权研讨会。

12. 1997 年 4 月 9 日建立了人权事务最高协调委员会,由负责人权的国务部长担任主席,并由下列成员组成:总理办公厅、司法部、内政部、外交部、全国教育和卫生部等部门的次长,以及委员会执行其职责所必需的其他机构的代表。委员会开展了重要的主动行动,起草或修改立法,以防止施用酷刑并惩罚那些施用酷刑和虐待的人。

13. 但是,这些发展显然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消除酷刑的施用。许多非政府消息来源仍然认为这些措施仅仅是“装点门面”的。

14. 在过去几年内,酷刑的模式似乎有了改变,在有些地方已不再那么残酷。现在,由于拘留的时间比较短,一些从事审讯的保安部队避免在被拘留者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从附件中可以看到,他们采用诸如以下的手法:蒙住受害者的眼睛,脱光受害者的衣服,用高压冷水冲洗他们,然后用鼓风机对他们吹风,挤压受害者的睾丸,使用非常侮辱性的语言和进行恐吓,例如威胁伤害他们或他们家属的生命和身体。同样,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和威胁强奸她们,而不是进行赤裸裸的强奸。对一般的刑事犯,有时进行拷打,作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手段,而不是为了逼供。Falaka(打脚心)、“巴勒斯坦式悬吊”(双手反绑后吊起来,使身体悬挂)和电击据报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安卡拉和迪亚尔巴克尔用得比较少,但是在该国的其他地区仍有发生。一些以前在土耳其东南地区常见的酷刑方式最近出现在 Aydin 和 Manisa 等城市,据称是因为警官是从东南地区调到那儿的。据报告,土耳其国会人权委员会发现在东南地区的警察拘留所内有施用酷刑的证据。路透社 1998 年 4 月 3 日的新闻报道中引用了国会委员会主席 Sema Piskinsüt 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她宣布她“看到了酷刑的痕迹...在审讯房内看到了电线和电话线、警棍、管子和水”。

15. 消息来源表明,绝大多数酷刑或虐待行为发生在候审或释放前的拘留阶段。据称对国家治安法院管辖之下的刑事特别是恐怖主义违法行为嫌疑犯和一般刑

事犯中被控偷窃的人仍然普遍施行酷刑。根据某些非官方的消息来源，警方比较普遍地施用复杂的酷刑，而武警一般施用拷打。

16. 据称最近几年来，特别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不加拘留而施以绑架、酷刑或虐待的现象有所增加，以规避有关拘留期的新规章。据一些律师说，个别人被带到荒僻地点进行审讯，在那儿对他们施以拷打和威胁。大多数情况下，保安部队要这些人做告密者。例如，有人对特别报告员说，1998年3月4日，公共工会同盟在安卡拉进行公开示威之后，Taylan Genç被三名便衣警察绑架，并被带往一片空地。在那儿，他们要他当一名告密者。当他拒绝时，他们威胁要杀害他。

17. 儿童方面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特别自最近从东南地区向大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移民的情况发生之后，对一般被控偷窃的儿童施加酷刑的现象有所增加。例如，据称有5名6至8岁的儿童于1998年6月4日在伊斯坦布尔 Beyoğlu 保安局遭受酷刑。据报告，Asrin Yesiller(7岁)、Yağmur Tanrisevergil(8岁)、Sultan Tanrisevergil(6岁)、Mihriban Tomak(6岁)和 Inanç Çaki(8岁)受到警察的毒打和性骚扰。法医学院的验伤证明中说，这些儿童7天不能工作。从儿童的总体来看，令人关注的是，当这些儿童被控犯下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管辖之下的罪行时，为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保护、包括立即提供律师的可能性就大大缩小。

18. 许多非政府消息来源以及一些当局都说，酷刑是有社会基础的。在家庭、在学校和在服兵役期间，殴打和类似的措施是惩罚和管教的一种手段。因此，对一些警官、特别是教育程度低的警官而言，使用拷打和酷刑来搜证是正常的。下面各节分别论述与医务人员的作用、检察官、司法部门和拘留期有关的问题。

B. 警察站和武警站的情况

19. 警察主管城市地区的治安，而武警主管约占该国面积 92%的非城市地区。内政部长强调，共有 20 万名警察和 30 万名武警，由于缺乏培训或者由于当时的心理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已经在保安局和武警内设立了人权部门，以便提供有关人权的内部培训，并设法把对保安部队提出的酷刑和虐待的指控降到最低程度。

20. 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报告，保安部队现在是按“先有证据然后怀疑”的方式工作而不是相反。为采用更加专业化和更加科学化的方式收集证据，保安部队正在接受专门的培训，学会使用依靠技术先进的刑事和法医实验室。此外，不久将扩大实施对审讯过程进行录像的试验性项目。根据某些受采访的当局，这些录像可用于驳斥对保安部队成员提出的没有依据的指控。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 Sema Piskinsüt 博士强调了塑造一个“好警察”新形象的重要性：一名警察应采用先进的技术收集最好的证据，并能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开展工作，而不再是不择手段地解决大量的案件。Beyoğlu 警察中心站采用了一种标准格式来记录供词，并根据这一标准格式征求嫌犯是否愿意将他的审议过程予以录像。在特别报告员访问这个警察站时，他注意到录像机并不是固定安装在审讯室里的。

21. 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在安卡拉、迪亚尔巴克尔附近的Çınar 及伊斯坦布尔等处的拘留所。在安卡拉，他访问了保安局反恐怖处的拘留所；在Çınar，他访问了Çınar 武警指挥部的拘留中心；在伊斯坦布尔，他访问了 Beyoğlu 警察中心站的拘留中心和保安局毒品部的拘留中心。所有牢房都是标准的，尽管在逮捕大量犯人时可能会做作特殊安排。例如，在安卡拉，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拘留者可能被关押在保安局反恐怖部的体育馆内，而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可能被关押在 Beyoğlu 警察中心站的地下室牢房里。

22. 在访问的拘留中心内，没有发现任何刑罚房。唯一的例外是伊斯坦布尔的反毒品部有一间隔离的房间，四周为黑色的软垫墙，特别报告员遇到的前被拘留者称这个牢房为“暗房”，表面上是让吸毒者在危机时刻使用。这个房间是完全黑暗的，既没有向外开的窗口，也没有人工光线。官方对这点的解释是，牢房内安电线会有危险。光线的唯一来源是一个大功率的电灯，光线从前厅墙上的小窗射进牢房。前厅向外开的唯一窗口是完全不透明的。因此，正如前被拘留者所指控的那样，前厅和牢房一起构成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据特别报告员咨询的一名国际专家说，这种具有很大的剥夺知觉效应的房间(无声无光)可对被拘留在那儿的人产生不利的影响。短期的影响可能包括：产生幻觉症、失去记忆、消沉和不安。还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心理影响。

23. 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安卡拉中心监狱、迪亚尔巴克尔的 E 型监狱和伊斯坦布尔的 Sağmalcılar 监狱，以便访问候审的囚犯，了解他们在拘留期间的待遇。在安卡

拉，没有允许特别报告员访问牢房，理由是面对有心理问题的囚犯(压抑者或吸毒者)可能对他的安全有危险。在那儿的一群青年学生，据称是“革命人民救世军阵线”的成员，拒绝接受特别报告员的个别访问。其中一名女孩的双眼下显然有大片青肿，但不可能从她那儿获悉她是如何受伤的。已经拘押她若干天的反恐怖部解释说，这些青肿是她在被捕时抵抗警察而造成的。在伊斯坦布尔，因一般罪行而候审的一些人作证说，他们在关押时受到酷刑或虐待，在迪亚尔巴克尔的一些政治犯也这么说。

C. 监狱的情况

24. 据称，在监狱内使用酷刑和过度使用武力来制止动乱的现象也很普遍。目前囚犯被关押在集体牢房内，但据说将采用单人小牢房的制度。政治犯和一些人权组织反对采用单人小牢房，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牢房将变成酷刑室。或采用大牢房制度，施用酷刑比较困难，因为同牢房的人可互相保护，并且酷刑或虐待一般是在囚犯押送到法庭或者另一个监狱时发生的。应该指出，普通囚犯一般比较喜欢单人小牢房制度。还有报告说，青少年囚犯往往和较年长的囚犯关押在同一个大牢房内。特别报告员会见了一个据说是酷刑受害者的 Sevgi Kaya，她声称她 15 岁时被关押在伊斯坦布尔 Bayrampasa 监狱的一个普通集体牢房内。

25. 监狱工作人员往往没有受过充分的培训。监狱看守的征聘可能更侧重于体格而不是社会心理特性。培训是极有限的(例如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一个月的关于如何对待囚犯和关于行政责任的在职培训；在迪亚尔巴克尔，首次培训一星期，然后每年培训一星期)。根据非官方的消息来源，特别在东南地区，据称倾向于选择具有极右或民族主义背景的人。1998 年年初，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 Sema Piskinsüt 博士走访了 14 个省的监狱和拘留中心，以便了解囚犯的情况。她的报告尚未出版，但她向特别报告员说了她的一些调查结果。她发现，恐怖主义囚犯受到了与其他囚犯一样的虐待。她的其他调查结果包括如下事实：对囚犯没有任何基于种族的歧视；法律诉讼程序为时过长；犯错误的执法官员受到其背景和所在省份局势的影响。她认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较好的培训得到改善。积极的方面是，监狱人员逐渐认识到虐待囚犯是不合法的——这是最近的发展。

D. 个别案例的情况

26. 特别报告员还有机会在安卡拉、迪亚尔巴克尔及伊斯坦布尔同一些据称受过酷刑的人谈话。附件内提到了其中一些案件。

27. 非政府消息来源还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他无法走访的一些地区的情况。特别报告了 Izmir、Manisa 和 Aydin 等地的一些酷刑案例。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涉及 1998 年 3 月 4 日在 Manisa 被拘留的 Çetin Paydar。据称他在酷刑下供认杀害了他的父亲，之后被关押候审。过了段时间，发现他父亲还活着，坐在一个公园内，才把他释放。

28. 1998 年 11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从迪亚尔巴克尔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E/CN.4/1999/61 号文件第 729 段报告了紧急呼吁的详细情况。1998 年 10 月 16 日，司法部监狱和拘留局批准对 Lesker Acar 进行监狱转移。但是，直至发出紧急呼吁的那天为止，他也没有被转移，并据称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内。该国政府在 1998 年 11 月 19 日的答复内说，已按 Lesker Acar 的要求于 1998 年 11 月 18 日将其转移到 Mardin E 型封闭式监狱内。还补充说，迪亚尔巴克尔和 Elazig 检察长办公厅正在调查这一案件。另一份答复说，Acar 先生在抵达 Elazig 监狱时引起了骚乱，而且他所说的遭到酷刑和单独禁闭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二、保护被拘留者免遭酷刑

A. 法律问题

29. 土耳其是大多数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的缔约国。根据这些文书，该国有义务消除酷刑的使用，并为遭受政府官员酷刑和类似虐待的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文书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和《欧洲防止酷刑公约》。应该强调，《土耳其宪法》第 90 条规定，“正式生效的国际协定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这些协定不能以其不符合宪法为由而按宪法提出上诉。”

1. 国内法律准则

30. 土耳其国内法有无数条款禁止国家官员施用酷刑和虐待，并宣布这种行为属于犯罪。《宪法》第 17 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遭受有关人的尊严的酷刑或虐待。”《刑法》还把使用酷刑定为罪行。第 243 条规定，一名官员“若对被告施用酷刑或采用残暴、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手段以迫使其认罪，应受到长达五年的监禁的严重惩罚，并应被暂时或终身取消公务员资格”。第 245 条适用于警方实施的酷刑，其中规定“凡授权使用武力者及所有警官在履行其职责或执行其上级的命令时，若威胁或虐待他人或导致他人身体受到伤害，或者在非法律和规则所准许的情况下确实殴打或伤害他人，应判处三个月至三年的监禁，并应暂时取消公务员资格”。

31. 负责人权的国务部长 Hikmet Sami Türk 博士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告诉特别报告员说，目前国会司法委员会正在审议一项修正《刑法》第 243 和 245 条的提案，将犯有上述各项罪行者的徒刑予以延长。第 243 条之下的徒刑从 1-5 年延长至 2-8 年，第 245 条之下的徒刑从 3 个月—3 年延长至 6 个月—5 年。此外，根据有关伪造医疗证明的《刑法》第 354 条，拟议的修正案允许将犯罪方判处四至八年的徒刑。

32. 1992 年 11 月通过对《刑事诉讼法》加以修正的第 3842 号法律第 13 条禁止酷刑及其他遭禁的审讯方式。此外，作为《刑法》第 254 条的补充的第 24 条禁止使用非法收集的证据：“调查和检察当局非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33. 1993 年 12 月 3 日，总理办公厅发布了一项关于尊重人权和防止酷刑与虐待的通告。该通告特别规定：

“ 2. 嫌犯不论犯有何种罪行，不得受到虐待；对酷刑和虐待的指控应进行必要的调查，不得拖延。

“ 3. 对查实参与酷刑和虐待的官员应立即提起法律程序，并尽早结束此一程序。

“ 4. 不论在监狱或在转移期间，不得使被定罪者或被拘留者受到虐待或侮辱性待遇。”

34. 1998 年 10 月 1 日，“关于逮捕、警方拘留和审讯的规则”的生效是另一个积极的发展。这项《规则》阐明了在人犯被捕、被关押或被拘留时警察应遵守的原

则和程序。《规则》第 23 条规定，“被关押的人，(a) 不得受到瓦解自由意志的身体干扰或情感干扰，如虐待、抑制自由意志、酷刑、强行服药、消耗体力、欺骗、使用蛮力或暴力、使用各种手段；(b) 不得许诺给予任何非法的好处。”

35. 《规则》中最为重要的条款可能载于关于监禁期限、释放和移交司法当局的第三部分。国际人权机构以前编写的报告曾一再批评被拘留者在被送交法院审判之前拘留的时间过长。例如，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关于土耳其情况调查程序结果的简要报告中认为：“将紧急状态地区被逮捕者出庭前扣留最长期限延至 30 天是过分的，可能使保安部队有机会对犯人施刑”（《第四十八届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 44 号》(A/48/44/Add.1)，第 25 段）。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如下事实：到 1997 年 3 月 6 日为止，根据 1992 年 11 月 18 日第 3842 号法律第 30 条的规定，对“集体”罪行和在国家治安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可拘留 15 天以下；在紧急状态地区，则可拘留 30 天以下。1997 年 3 月 6 日的一项法律废除了第 3842 号法律第 30 条并修正了《刑事诉讼法》和《设立国家治安法院及其司法程序法》以及 1992 年 11 月 18 日的第 3842 号法律。

36. 新《规则》第 13 条实际上作了一些修改，1997 年 3 月 6 日法律的第 3 条规定：“因一人或两人犯下的罪行而被捕的人若不释放，须迟至 24 小时内由主管法官提审，但由最近的法官提审所必需的时间不包括在内。如果罪行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的管辖范围，则时限为 48 小时。”第 14 条规定，如果所犯下的是集体罪行，包括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管辖范围的罪行，检察官可通过书面指令将这一期限延长至 4 天。此外，如果在 4 天之后仍然没有结束调查，检察官可要求法官把嫌犯交由法官提审之前的关押时间延长至 7 天。至于在紧急地区犯下的并且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管辖范围的罪行，根据检察官的要求以及法官的裁决，可把 7 天的拘留期延长至 10 天。

37. 《规则》第 20 条规定，“被捕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并且在没有其他人可以听到对话的环境下会见律师”。但是，如果罪行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的管辖范围，则被捕者仅在法官下令延长关押期限时才可见律师。

38. 第 6 条还为逮捕时保护个人规定了重要保障措施。特别是，“应告诉该人他有权通知其亲属他被捕一事以及被捕的理由，并有权保持沉默，无论罪行属于何种性质”。但是，将被捕一事通知亲属的权利有一重要的限制，即：通知不得“影响对背景和案情的调查”。此外，《规则》第 9 条规定，“如果罪行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的

管辖范围，则在不会妨害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将通过同样的方式通知亲属”(底线为另加)

2. 实 施

39. 新的《关于逮捕、警方拘留和审讯的规则》以及禁止酷刑和虐待并把此种定判为罪行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和《宪法》的各项条款表明，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在缩短警方拘留期限方面，法律框架已取得了重大的改进。但是，尽管政府作了努力，土耳其仍然存在酷刑现象。部分原因是，检察官没有充分地监督被拘留者在拘留期间的待遇，没有认真地调查被拘留者提出的有关遭受酷刑的指控。此外，几乎所有与特别报告员谈过话的律师都坚持说，在法院，特别是在国家治安法院，定罪几乎完全以被告的供词作为根据。土耳其人权协会的一名律师估计，90%的定罪是完全根据证词裁决的。其他律师说，在他们参与过的国家治安法院案例中，从来没有因证词是通过酷刑或虐待逼供得来的而使得证词成为不足采信。

40. 《检察官作用准则》第16款规定：

“当检察官根据合理的原因得知或认为其掌握的不利于嫌疑犯的证据是通过严重侵犯嫌疑犯人權的非法手段，尤其是通过拷打，残酷的、非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或以其他违反人权办法而取得的，检察官应拒绝使用此类证据来反对采用上述手段者之外的任何人或将此事通知法院，并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确保将使用上述手段的责任者绳之以法。”

41. 检察官不积极调查所收到的大量酷刑指控，显然是玩忽职守。

42. 尽管特别报告员会见的所有国家治安法院检察官和公共检察官都断然表示逼供获得的证词是不可采信的，从某一国家治安法院的一名检察长坦率的讲话看来，确实存在着“漏洞”。例如，他告诉特别报告员，大多数伙同他人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指控主要是以被告的证词为依据的，因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往往没有佐证。但是，特别报告员了解到，在一些伙同作案的案例中，法官释放了声称自己被逼供的被告，但没有对酷刑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至于法官是否因证据是非法获得的而裁定供词不予采信，还是出于其他理由而释放被告，则不很清楚。

43. 同一位检察长还告诉特别报告员，即使证词是在酷刑下获得的，但如果存在佐证，则仍然是可以采信。他解释说，一些恐怖主义分子在监禁时把自己弄伤，看上去象是警察对他们施用了酷刑。他还说，检察官一般认为警方的意图是好的。

44. 特别报告员收到证词的一些据称受过酷刑的人一再声称，他们后来撤回了拘留期间由于受到酷刑而作的供词，但国家治安法院的检察官对此不予理会。这些据称受害的人还声称，检察官不会认真调查他们关于受到酷刑的指控。以 Ahmet Fazil Tamer 律师的案件为例，鉴于其受伤的严重性这一案件是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Tamer 先生向代表团表明，他于 1994 年 4 月 19 日在伊斯坦布尔因被控属于一个非法组织而被拘留。他在 Gayrettepe 保安局被关押了 14 天。他声称，在这段期间他遭受到严重的酷刑，包括“巴勒斯坦式”悬吊。由于被悬吊，他声称双臂暂时瘫痪，在酷刑后的四个月内不能使用双手。最近，他被拘留后四年半所作的检查表明，他的左臂仍然非常虚弱，左手没有知觉。国家治安法院法医签发的最初的医疗证明仅仅说他四天不能工作，但狱医后来证明由于受伤他 15 天不能工作。Tamer 先生声称，他被带到国家治安法院的检察官面前时，检察官在载有酷刑指控的文件上写道：Tamer 先生不能使用他的双臂，因此他无法签名。所以，他的指印代替了他的签名。尽管有如此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仍然根据他的供词把他关在监狱里候审。在审讯之前，他一直被关在监狱内。据他所知，对他的酷刑指控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调查，并且肯定没有根据《刑法》第 243 或第 245 条起诉任何警官。

45. 国家治安法院的检察官不认真对待酷刑指控的另一个迹象是，他们转交给公共检察官处理的案例少得可怜。特别报告员会见的国家治安法院检察官几乎都承认他们向公共检察官转交的指控不多。实际上，他们无法提供转交公共检察官案例数量的任何统计数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千篇一律的解释是：转交的案件比较少，是因为恐怖主义者得到指示要他们声称遭受酷刑，以败坏警方和整个司法制度的名誉。

46. 尽管被拘留者的拘留期限大为缩短，然而国家治安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拘留者的拘留期限仍然是个问题。被控犯下一般罪行的被拘留者可在被监禁后的任何时间会见律师。但是，如果罪行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的管辖范围，则被拘留者仅在法官下令延长监禁时，换言之，即在四天之后，才可以会见其律师。此外，据参与这类案件的律师说，会见是在警察在场之下进行的。两者，在作出候审决定之时，律师

不能够看到案件档案。律师仅仅在检察官公布起诉书之后才可以看到案件的档案，一般需要一至二个月。

47. 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注的是，许多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最上层的官员，其中包括高级警官，不知道新的《规则》所规定的拘留期限。他们几乎都说，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管辖范围之内的拘留者的拘留期限是四天，这实质上承认两天之后的延期拘留实际上是一定会批准的。然而更严重的是，许多官员根本不知道这些规则，说拘留期是 2 至 10 天，有些甚至提到以前的规定：在提交法院之前的拘留期可长达 15 天和 30 天。此外，一些官员坚持说，即使是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拘留者，也可以立即会见律师。不仅高级官员不熟悉现行的规则，下层公务人员显然也不知道新的标准。

48. 鉴于大多数观察员都说酷刑一般发生在拘留后的头两天，则在涉及三名或三名以上人犯的案件中或者属于国家治安法院管辖范围的案件中，在法官裁定释放、候审或延长拘留期之前，等待的时间长达四天，会使被拘留者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而且，法律并不要求在就延长拘留一事作出裁决时应让被拘留者出庭。在 Brogan 等人诉联合王国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裁定，延迟四天六小时不符合欧洲法院关于即时审讯的要求。¹ 由此可以推论，四天之后若还要延长，不把嫌犯本人提交法院审讯，是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在紧急地区可准许延长 7 至 10 天这一点，不能改变这一推论。欧洲人权法院的立场是：只有在同时采取其他保障措施如人身保护和有权在 48 小时后咨询律师等前提下，紧急状态的 7 天拘留期才是正当的。²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9 条的一般性评论 8 中认为，“迅速”提交法院审讯的时限“不得超过几天”。³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原则 7 规定，“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

¹ Brogan 等人诉联合王国欧洲人权法院判决,1998 年 11 月,第 62 段。

² 参阅 Brannigan 和 McBride 诉联合王国(5/1992/350/423-424)(1993 年 4 月 22 日,第 62 至第 66 段;Aksoy 诉 Turkey,ECHR(100/1995/606/695)(1996 年 12 月 18 日),第 82 至第 83 段。

³ Terán Jijón 诉 Ecuador,No. 277/1998。委员会认为 5 天期限违反第 9(3)条。

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应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四十八小时”。

49. 另一个问题是，新的《规则》中规定，如果拘留期超过 48 小时，警方必须要求检察官批准。实际上，延期的要求很少被拒绝。颇可说明这一点的是，几乎所有谈话的人，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被告律师，都提到了四天的期限。此外，一些检察官承认，延长拘留的决定完全以提交给检察官的要求延期的报告作为依据。国家治安法院的一名检察长指出，案件档案由反恐怖处保管，因而使他很难作出决定。他还说，警方往往在 48 小时期限即将到期时提出延期要求。因此，他不得不相信反恐怖处。同样，国家治安法院的另一名检察长承认，警方的延期要求很少被拒绝，并指出警方代表检察官进行调查。因此他说，两方之间必须相互信任。

50. 确保被拘留者的权利得到尊重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清楚记录每个人被捕和拘留的情况。在这方面，《关于逮捕、警方拘留和审讯的规则》第 12 条就警方在收押登记册内应登记的资料规定了非常清楚的准则。这些准则符合《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尤其符合其第 12 条。《关于逮捕、警方拘留和审讯的规则》第 6 条还规定，一个人被捕时应立即被告知他的权利。

51. 但事实上，特别报告员发现这个过程中存在某些缺陷和漏洞。在访问一个武警站时，他发现，被拘留者被带到武警站的时间与实际把拘留记录在案的时间之间存在着误差。就这个具体案例而言，嫌犯被带到武警站的时间是凌晨 3 时，但到了上午 11 时才记录在收押登记册上。值勤官员解释说，在检察官签发书面拘留准许之后才能把拘留记录在案。特别报告员在一个警察站发现的另一个缺陷是，在收押登记册上登记收押的官员既没有签字也没有留下姓名；只有登记释放或转移被拘留者的官员才在收押登记册上签字。在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不记下收押被拘留者的官员的姓名显然为追究责任造成了困难。

52. 此外，特别报告员获悉，所有警察站和武警站均应备有细则，其中载明被逮捕的人的权利，必须在其被捕时将该细则发给他。在上述武警站，值勤官员承认那里已没有任何一份可发给被拘留者的这样的细则。但他说，被拘留者是被口头告知他们的权利的。而当特别报告员查问关押在该武警站的人时，他们表示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他们有哪些权利。相反，他们被要求在他们没有阅读过的声明上签字，声

明的大意是他们放弃求见律师的权利。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广泛地对所有治安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新的《关于逮捕、警方拘留和审讯的规则》。

B. 医疗问题

53. 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在本报告中用一节来专门论述医疗专业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论从预防的角度还是从拘留和调查的角度来看，医疗专业一般均与酷刑现象有着某种关系，而且因为医疗专业在土耳其的环境中有着特别的中心作用。尤其是，在土耳其，可以在下列方面发现很多问题：缺乏法医培训和医务人员配备；为在押人员开医疗证明；狱医的作用以及狱医的独立性值得怀疑。但是，首先有必要了解法医领域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各个环节的责任。

54. 据主管人权的国务部长说，法医须对自己的专业协会负责，也须对卫生部负责。但是，这一专业协会，法医理事会(CFM)，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在司法部督察下开展工作的。司法部长负责任命该理事会的主席以及专科医生委员会的主席，如负责有关酷刑问题的委员会的主席。根据一个非政府的消息来源，法医和司法制度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最好例证是，法医的办公地点设在法院之内。活跃在法医领域的还有法医学院，其成员往往应政府的要求而作为专家见证人在法医理事会内兼职。此外，还有各医学院的法医系，包括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医学院内的法医学会(FA)等专业机构。

55. 由政府委任并对卫生部负责的普通医生以及其他医务人员有他们自己的专业协会，如土耳其医会会(TMA)。公务员不一定非加入这一专业机构不可，尽管他们可以参加，但军医不能成为这个协会的成员。因此，对这两类医生的不合专业标准的渎职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就可能很成问题了。TMA有权采取纪律措施，并往往与独立的地区医学会一起采取此种措施，包括对签发虚假的医疗报告采取此种措施。这是唯一可以禁止医生行医的机构，禁止时间可达6个月。这个机构还可为延长禁止行医的时间向法院提起程序。据TMA主席说，政府官员极不愿意执行这类决定，从以下论述的Nur Birgen医生案件中也可看出这一点。TMA还可以在正式报告不记载明显的酷刑伤痕的情况下参与发给“替代医疗报告”。

56. 最后，狱医自成一类，直接受雇于司法部，因此在级别方面低于所在监狱的狱长。从下文可以看出，这难免使人们对其独立性存有疑问。

1. 缺乏专门知识和装备

57. 对于许多履行法医职责的医生缺乏专门知识这一点，会见的许多官方人员和非官方人员，包括卫生部长，都表示关注。这主要是由于普通医生的培训有缺陷，而且愿意专门从事法医的医生不够多。

58. 估计在土耳其开业的法医专业人员的全国总人数大约是 175 至 200 名。据 FA 主席说，在土耳其的 40 所医学院中，仅仅有 20 所开设了法医专业。卫生部长表示，即使在设有法医专业的学校内，许多人也不选择学习这一专业。由此引起的专业人员短缺意味着，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普通医生往往必须履行法医的职责。然而，由于法医学并不是他们所受的一般培训的一部分内容，他们对酷刑的诊断不具有任何专长或学识，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法医检查和编写报告。FA 的主席建议，第一步可以先向普通医生提供标准的查验表格，以确保不遗漏任何检查领域。CFM 主席后来告诉特别报告员：将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伊兹密尔和安卡拉实施一个试验性项目，向医生提供标准表格，作为检查方法的指导。人们希望这样的项目能够很快地扩大到农村地区，因为根据官方和非官方的消息来源，农村地区缺乏专门知识的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报告员了解到的处于初步阶段的其他相关发展包括：全面提高法医人数以及发布关于医生应如何检查的医治酷刑受害者的政府准则。

59. 还值得指出的是，供医生诊断酷刑用的专门技术不足。迪亚尔巴克尔 E 型监狱的狱医表示，当他收到不留任何肉眼可见痕迹的酷刑(如电击)的指控时，他没有任何设备可使他能够验明皮下伤害。

2. 医疗证明问题

60. 据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会见的若干检察官说，为了对一项酷刑指控进行调查，声称受害的人必须能够出示医疗证明或提供一名见证者来证实他的指控。显然，鉴于酷刑的性质，很难提供见证人的证词，因此医疗证明的准确性对施用酷刑者会不会受到惩处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1998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新的规则(见上

文第 34 段)中规定,所有在警察监禁下或作陈述的人在到达拘留所或离开拘留所时,或在拘留期间因任何理由而转移时,必须立即给予医学检查。据主管人权的国务部长说,《刑法》第 345 条修正案把签发对酷刑和虐待加以掩盖的虚假医疗报告的行为定为罪行,并判以四至八年的监禁。关于惩罚逼迫医生签发此类报告的官员的问题,国务部长说,他们将因滥用职权而被起诉。卫生部长也强调,医生是完全独立的,不会开假证明。然而,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前和访问期间从各种渠道收到的资料都表明,进行医学检查的环境使得医生开假证明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些拒绝签发此类报告的医生往往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

61.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虚假医疗证明的签发,主要原因是被控施用酷刑者直接参与开证明的过程。有一份报告说,他们有时甚至完全不让医疗专业人员参与。一消息来源称,在 Batman 的一些警察自己有医生图章,国会人权调查委员会主席显然也证实了这一点。往往,被控施用酷刑者本人陪同受害者到他们所选择的医生那儿,而且他们倾向于选择他们知道不会记载任何酷刑伤痕的医生。据报告,有时医生实际上没有查看病人就在没有作任何检查的情况下将证明开给官员。当医生确实查看病人时,据说官员往往在整个检查过程中一直留在现场,尽管主管人权的国务部长强调检查应该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有时,官员在门外等待,但受害者和医生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场,因而心存畏惧。一项普遍的指控是,医生仅仅凭目力来查看而不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即使医生进行身体检查并问及受伤的原因,受害者也往往拒绝回答,因为官员就在附近。签发准确的医疗证明的另一个障碍是:即使报告中记述了伤害情况,也不一定明确地指出是因酷刑造成的,有时报告中仅仅说受害者在若干天内不能工作而不具体说明受伤的原因,甚至根本不提受伤一事。

62. 当医生开出准确的医疗证明时,据称他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不是要他们修改具体的证明就是要他们停止签发载明受到酷刑的证明。在第一种情况下,证明一般交给同来的官员。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官员不同意报告的内容,他们就可能试图强迫医生更改报告,或者他们可能撕毁报告并另外找一名愿意开假证明的医生。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他们往往在晚上找医生或到医生家去。例如,来自 Aydin 省 Incirliova 的 Eda G ven 医生说,1997 年 11 月武警人员把 6 名有酷刑伤痕的人带到她那儿。第二天,官员要她修改报告,被她拒绝。结果,她遭到审讯,理由是她

玩忽职守，尽管后来宣判她无罪。迪亚尔巴克尔医学会的主席建议，医生应该坚持在工作时间内在初级保健中心或医院进行医学检查；若有可能，应由法医进行医学检查。TMA 则指示医生不要在晚上签署医疗证明。

63. 有时，医生可能会受到更厉害的威胁。特别报告员获悉，一些医生由于开了准确的医疗证明而遭到拘留和虐待或者酷刑。若干非政府组织分别都报告的一个案件涉及 1994 年被委任为迪亚尔巴克尔初级保健中心主任的 M nsif Cetin 医生。他和他的同事们决定拒绝在未检查病人的情况下签发任何证明。据称，有关官员开始的反应是施加威胁，撕毁证明，然后于 1996 年 8 月将 Cetin 医生拘留 7 天，据报告他在拘留期间遭到各种各样的虐待，包括拷打、殴打和威胁。在他释放时，紧急状态地区长官裁定应将他转移出该省。尽管 TMA 的主席指出这类压力现在比过去几年要少，但据报告，特别是在东部和东南部，这样的情况仍然很严重。实际上，她指出害怕受到这类压力是医生不愿意在那里开业的主要原因。

64. 医生的职业前程也有可能受到不利的影响，不是遭到某种形式的“流放”，如 Cetin 医生的情况，就是不考虑把他们安置在重要的职位上。例如，在委任 CFM 主席职位时，TMA 向司法部建议由 Sebnen Korur 医生担任。但她的委任被拒绝了，据称是因为她参与发给 TMA 的“替代医疗报告”。另一方面，愿意签发虚假证明的医生显然受到当局的保护，即使他们受到其专业组织的制裁也是如此。例如，CFM 第三专科医生委员会主席 Nur Birgen 医生为 1995 年 7 月被拘留的 7 个人签发了虚假证明，因而被 TMA 禁止开业 6 个月，现在正对他进行起诉。尽管如此，司法部并没有令其暂停工作，据说理由是她是公务员，她的公民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65. 特别报告员在整个访问期间收到的个人证词进一步证明这些指控是有根据的，但与此相反的是，现任 CFM 主席表示不知道医生受到这类压力，她还否认她或她的工作人员曾经受到这类压力或者被指控签发过虚假的报告。但是她承认有必要解决医疗证明从医生转交给检察官的问题，并告诉特别报告员说，一星期内将采用新的方法：证明将放在密封的信封内由医生寄给检察官；在医生将证明交给警察再由其转交检察官的情况下，信封也应密封，以防止被打开。

3. 狱医的作用和其他有关监狱的问题

66. 监狱内若有独立的医生，对监狱内酷刑或虐待的发生可能会有很大的遏阻作用。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监狱工作的医务人员是司法部的雇员，因而级别低于监狱长。所以，一些非官方的消息来源声称，这些医生在履行职责时受到压力，不仅在为囚犯开医疗证明时如此，在决定囚犯是否应转送医院进行紧急或特殊治疗时或者在确定他们是否得了不治之症时也是如此。监狱总长认为这种关系并无不当之处，因为监狱所雇的医生主要从事预防和诊断，而严重的病往往是在医院治疗的。他强调，医生可自由决定是否有必要转诊。在这方面，监狱长在级别方面并不高于医生。他还指出，医生也可能受到要求转诊的囚犯的压力。然而，特别报告员关注的是，不论实际做法如何，仍然存在可能滥用职权拒绝转诊要求的情况，并认为应尽可能弥补在保护囚犯方面显然存在这一漏洞，这样做还可防止有人提出不实的指控。

67. 关于囚犯从监狱转移到医院的问题，卫生部长告诉特别报告员已计划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建造专门为囚犯治病的医院，并说转移的囚犯目前被置于普通医院的特殊囚犯病房内。据这位部长说，被转移到这类医院病房的囚犯可以自由地选择医生，受到与其他病人一样的待遇。非政府消息来源则指称，囚犯在转移过程中往往受到虐待，医院的特殊病房不能为治疗重病提供必要的设备，而且在特殊病房内工作的医务人员可能会受到压力。有一例为证：三名护士在武警的要求下被调离特殊病房，因为他们感到这三名护士与囚犯之间的关系过分亲密。

68. 应该指出的最后一个与监狱有关的问题是一些患有不治之症的囚犯仍被关押在监狱里。其中许多人，例如伊斯坦布尔 Sağmacılar 监狱(Bayrampaşa)的一群囚犯由于长期绝食而得了一种称为 Wernicke-Korsakoff 综合症的变性疾病。《刑事诉讼法》第 399 条规定，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延期或暂缓行刑。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许多指控说，尽管非政府组织代表这些患有不治之症的囚犯提出了一系列的请愿，但该条没有得到执行。一个非政府消息来源说，据报告，官方的答复是：至少就 Bayrampaşa 监狱中患有 Wernicke-Korsakoff 综合症的那些囚犯而言，问题是他们处于候审阶段，还没有定罪，因而不能给予宽待。尽管这可能是对该条的一种不失为准确的法律解释，但对尚未最后定罪的人适用的规则比对已经定罪的人适用的规则更为严格，似

乎是自相矛盾的。就特别报告员的职责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释放这些囚犯，而是要确保他们得到人道的待遇。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劣到必须释放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到监狱外治疗，那么就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不治罪问题

69. 尽管据报治安部队普遍施用酷刑，特别是与实施反恐怖主义法案件有关的酷刑，但却极少对其成员进行调查、起诉或惩罚。人权组织宣称，由于土耳其政府未能落实国内外禁止酷刑的条例，已形成了不惩罚官员的风气，助长了在监禁期间，对被拘留者进行虐待的行为。

70. 上面大略提到的《土耳其刑法》中的一些条款，特别是第 243、245 和 345 条，把酷刑和虐待列为罪行(参见上文第 30-31 段)。实行保护以免遭受警官虐待的另一些法律措施，包括《刑法》第 181 和 228 条。第 181 条规定“政府官员若滥用职权或未遵照法律程序和条件，剥夺某人的人身自由，即应判处为期不少于一年，但不超过三年的监禁”。第 228 条也规定，“公共官员若滥用其权力，违犯法律和条例，采取了对某人，或对某一公共官员的任意行动，或者下令，或促使他人下令采取此类行动，则应判处为期三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倘若被告怀有特殊的目的采取的此类行动，应加重判刑，但不得超过原刑期的三分之一....”。

71. 特别报告员会晤的大部分政府官员均承认，确有政府人员施用酷刑的情况，但他们一概否认这些是一贯的和惯常的作法，声称这些只是个别的偶然事件，且违法者已受到了惩罚。实际上，起诉警察的案件看来确实有所增多。这可能显示政府作出了较大的承诺，但也反映出由于传媒对若干起重大案件更加关注，提高了民众的意识。

72. 然而，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仅极少的指控导致起诉，即使判定有罪，所裁量的刑罚，也与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不相称。导致这种情况的若干原因，包括一些司法上的障碍、警方领导层对其警官的袒护、检查官本身不具备展开调查并对违法者提出刑事起诉的意愿，和法院的量刑不当。

73. 迪亚巴克尔省首席检查官提供了在《刑法》第 243 条(酷刑)和 245 条(虐待)范围开展调查的案件统计数字。1998 年期间根据 243 条提交检查厅的 12 起指控案

件中，有 5 起尚待调查、1 起被裁定为不属于它的司法管辖范围、4 起依其地理位置，被裁定为不属于它的司法管辖范围、2 起被裁定不起诉和 1 起裁定予以起诉。在根据第 245 条提出的 20 起案件中，有 9 起尚待进行调查、1 起被裁定为不属于它的司法管辖范围、3 起依其地理位置，被裁定为不属于它的司法管辖范围，有 7 起裁定不予起诉。

74. 伊斯坦布尔的首席检查官提供了下列统计资料。1996 年有 113 起被起诉的案件、1997 年有 93 起案件和 1998 年的 39 起案件。尽管仍有许案件尚待审理，检查官告诉特别报告员，这些起诉致使 15 人被定罪，和 120 人获得无罪开释。定罪后判处的最长刑期是，因违犯《刑法》第 243 条而判处的 3 年徒刑。

75. 代理治安总长告诉特别报告员，1995 年至 1997 年期间，有 152 起案件属于《刑法》第 245 条(虐待)的范围，总共涉及到 411 名警官。在这 152 起案件中，只有 4 名警官已被判定有罪，而另外一些涉及到 140 名警官的案件还尚待审理。在第 243 条(酷刑)的范围内，上诉的 105 起案件牵涉到 313 名警官。在这些案件中，123 名警官已得到无罪开释、对 47 起案件作出了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的裁决、有 6 起案件未准予起诉，还有 137 起案件尚待审理。根据代理治安总长提供的统计，没有任何一个涉案的警官被判处最长的有期徒刑。

76. 在 1998 年 12 月 11 日转呈的一份资料中，政府提供了有关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1998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对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和惩罚的下列统计资料。在《刑法》第 243 条(酷刑)和第 245 条(虐待)的范围内，遭到司法起诉的执法人员，分别为 534 和 2696 人；在第 243 条和 245 条的范围内，遭到行政起诉的执法人员，分别为 396 和 4508 人。

77. 即使起诉导致定罪，所判处的徒刑亦与罪行的严重程度不相称。以最近为例，1998 年 5 月最高法院维持了贝伊奥卢第一一审刑事法庭的判决。一审庭因警方于 1994 年 7 月 4 日拘留了人权援助协会的一位成员 Yelda Ozcan 之后对她施用了酷刑而对 Cemalettin Turan 警长处罚款。一审庭原判处该警长监禁 3 个月，从 1996 年 12 月 26 日起停职三个月。然而，监禁徒刑却被改判为数额约合 1.50 美元的罚款。

78. 对谋杀记者 Metin Göktepe 案的审理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可见土耳其不治罪风气之盛。Göktepe 在 1996 年 1 月 6 日试图报道 Rıza Boybas 和 Orhan Özen 葬礼遭逮捕后，被殴打致死。上述葬礼的两位死者也是 1996 年 1 月 4 日在伊斯坦布尔

Ümraniya E 型监狱中被毆致死的囚徒。起初，当局宣称未曾拘留 Goktepe，但后来又正式承认，他确实在拘留期间被毆打致死。

79. 数月后，开庭对被控杀害 Göktepe 的 11 名警官进行审理。与往常处理此类案件一样，审理的案件因“安全原因”被转到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其它省份(艾登省和阿菲永省)。这些被告警官于 1997 年 7 月被捕，但这是在极度的公众压力之下和共和国总理和总统的过问下才采取的举措。然而，却在 1997 年 9 月对其中四名警官解除了预审拘留。1998 年 3 月 19 日，六名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警官最终得到无罪开释，而另外五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6 个月。这是法院对原准备判处的 12 年徒刑作出的减刑判决，理由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这几名被告表现良好。同时，法院还认为“不能确切断定，这些被告是否怀着谋害之心实施的毆打”。然而，法院的这项裁决，随后因“调查不足”被最高法院推翻。

80. 1998 年 8 月 20 日，阿菲永重罪刑事法院开庭重审 Metin Göktepe 被害案。就在本报告定稿之前，特别报告员得悉五名还押的警官已经获释。法院委员会宣布，法院是在考虑到被告们在狱中的关押期之后作出这一决定的、审理本案所需要的证据已经收集就绪，被告不可能加以篡改。法院委员会确实禁止这些警官出国旅行。

81. 在对国家人员提出任何起诉时会发现的一个缺陷是，1913 年在奥托曼时期编纂的《起诉公务员法》总想为以官方身份行事的公务员提供某种程度的豁免。一旦出现属此项法律范围的案件时，就由一些通常未经法律培训的公务员组成一个行政委员会，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应对当事公务员提出起诉，还是干脆由其上司实行纪律制裁。行政委员会若作出须提出上诉的裁定，即将案件移交主管法院，并附上应对该公务员提出何种罪名的建议。然后，再由检查官亲自展开调查。

82. 在这方面，该法律的作用是阻止和拖延对官方不法行为的起诉。这一行政委员会的司法权限更加令人感到混淆不清的是，治安部队的成员虽被划为公务员，但他们只是就一般执法义务，也就是说，按其行政职务身份行事时，才属此法律的涵盖范围。譬如，当几名转押被拘留者的宪警被控对那个人施用了酷刑时，首先必须将申诉书递交行政委员会，因为转押是一般执法任务。然而，如被控宪警的行为发生在根据检查官的命令逮捕一名犯罪嫌疑人时，他们就是以司法，而不是以行政身份行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投诉则将由检查官直接受理。

83. 迪亚巴克尔监狱 10 名囚犯遭杀害一案即是《起诉公务员法》有碍司法权的一个确凿的实例。1996 年 9 月 24 日，特别行动队，宪警和狱警对该狱中暴发的一场骚乱进行了弹压。在弹压期间，10 名囚犯被殴致死，至少有 46 人受伤，受伤的人多半是头部遭到打击。据报，所有死亡的囚犯头盖骨都被警棍、枪托和棍棒打裂，而且死者全身遍布遭重殴的明显创伤痕迹。尸体解剖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这 10 名囚犯是遭酷刑而死亡的。目前对 29 名宪警和 36 名警官使用过度武力和过失杀人的起诉案件还尚待审理。然而，检查官仅向受伤的囚犯进行不彻底的询问便根据询问的结果驳回了向 30 名左右狱警提出指控的申诉，检查官只是询问那些囚犯谁打伤了他们，并没有问清他们是否见到别人被打伤。由于这些囚犯多半无法辨认殴打他们的人，所以无法提出起诉。

84. 检查官决定对 65 名警察和宪警提出起诉，然而，尽管警察是由他派出，并且是在归他管辖的拘留营内犯下罪行的，却认定上述警察所履行的是行政职责，而不是司法职责。因此，便将此案呈送行政委员会。然而，行政委员会认为，这些警察是检查官召唤的武装部队，所履行的应该是司法职能。因此，检查官不得不向迪亚巴克尔重罪刑事法院提出起诉，但该重罪刑事法院以此案属行政案件因此属行政委员会管辖范围为由拒绝受理。结果，只得由最高上诉法院的刑事分庭来解决纠纷；刑事分庭裁定此案不是行政案件并将其退回迪亚巴克尔重罪刑事法院。在杀害事件发生了九个月之后，才于 1997 年 6 月举行了第一次审理，目前此案仍悬而未决。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法庭未对这些被告实行羁押候审。此外，有时警方带上法庭的证人本身即是被告。对此，许多律师说，这是恫吓证人的惯用手法。

85. 主管人权事务的国务部长向特别报告员通报，已对此项法律提出修订案文，其首要目的是加速审理进程。拟议的修正案第 7 条规定，行政委员会必须在提出控罪之日起 30 天内裁定是否应由检查官对案件展开正式调查。这 30 天的限期，如有必要可予延长，一次至多延长 15 天。届时，倘若不能在限定时期内作出决定，则视为已批准开展调查。这一修正案虽在目前情况下可能解决对现行诉讼程序的拖延问题，但特别报告员认为，修正案并没有解决更具疑义的问题，即由未经法律培训的公务员组成的机构来裁定是否针对有关其他公务员不法行为的指控提出起诉这一作法是否合适的问题。

86. 另一个司法管辖权限问题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属某一国家治安法庭司法管辖的被拘留者提出的酷刑指控，得由重罪刑事法院的检查官展开调查。结果，国家治安法庭系统有可能根据据称来自逼供的证据，对被拘留者进行审判，并且可能抢在重罪刑事法院尚未对上述所指控的酷刑作出裁决之前，下达对罪行的刑事判决。这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对马尼萨案的审理即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在此案中，警官对一些学生施加了酷刑。伊兹密尔省国家治安法庭抢在重罪刑事法院对犯有酷刑行为者进行审判之前，依据学生在酷刑诱逼之下所作的招供，对他们作出了有罪的判决。

87. 《土耳其刑事诉讼法》规定，检查官在收到有关酷刑的投诉或其它表明有可能发生了某一罪行的上报之后，必须先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具备提出起诉的依据(第 153 条)。倘若调查证实酷刑指控是有根据的，检查官即应对施加酷刑者提出起诉(第 163 条)。然而，人权组织和辩护律师们指出，检查官并无提出起诉的意愿。

88. 检查官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是，他们必须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警察展开对罪行的初步调查。一方面，检查官本身就把警察视为合作伙伴，自然也就不愿与他们形成隔阂。另一方面，警方调查其同僚所犯的罪行，显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至少有一位检查官告诉特别报告员，倘若要让检查官来管制警察的虐待行为，则必需创建一支法警队伍。

89. 检查官还面临着证据问题。被害人的作证本身尚不足以成为支持定罪的证据，检控方还必需拿出物证。许多案件缺乏物证。其中大部分情况是不曾进行详细的体检(参见上文第二章)。此外，并不是所有的酷刑或虐待都会在身体上留下伤痕。在另外一些案件中，由于被拘留者经常是在被蒙住双眼的情况下遭受酷刑的，他们无法辨认出谁是逞凶者。即使受害者能辨认出逞凶者，也无需传唤被告出庭以供指认。为进一步地阻碍诉讼进程，有时甚至将被告转调到其它城镇，继续值勤供职。这样的转调显然使得检查官难以向被告取证。

90. 在受到广泛报道的马尼萨案中，有 16 名青少年，因被控以加入某一非法组织的罪名，于 1995 年 12 月遭到马尼萨省治安局反恐怖主义处逮捕和拘留，这一事例显示要控告那些犯有酷刑行为的警察或治安官员极端困难。这些学生遭拘留后，趁其家人进行简短探访的机会，向家人诉说了曾遭受酷刑的情况。他们的家人立即向检查官提出申诉，在家人的要求下将这些学生送去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时，

学生们声称，警官们站在他们身边，而医生既没有进行体检，也没有询问他们是否感到生理不适或心理痛苦。出具的体检证明书没有确认他们曾经遭受酷刑。

91. 此后，学生们的家人试图再安排一次独立的体检，伊兹密尔医疗所也要求批准对这些学生进行体检的申请，但体检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然而，根据官方体检报告、用于记录学生遭酷刑和生理伤痛情况的问题调查表，以及医院的记录，该医疗所认定，这些学生曾遭受用一系列手法实施的酷刑。

92. 尽管有此报告，但检查官拒绝对警察立案审理。随后，在解除了的监禁之后，对这些学生进行的体检查明，这些学生曾遭受了如下一些酷刑：由喷射冰水造成的耳朵变形、挤压男孩的睾丸留下的创伤、这些孩子们染上了肺结核病、生殖器受到电击以后经常疼痛。尽管有了这些体检上的证据，检查官还是拒绝立案审理。最后，在媒体加以密集报导和该区域选出的某一位议员向总统发出呼吁的压力之下，检查官终于在收到各项指控六个月后，于 1996 年 6 月 4 日对警察进行立案审理。

93. 在国家治安法庭和重罪刑事法院在对这些学生进行审理的同时，马尼萨省重罪刑事法院也开始了对警察的审理。重罪刑事法院在对案情的审理中发现，除警方宣称这些被告犯有罪行之外，并无确凿的证据，因此，无罪开释了学生。然而，国家治安法庭则依据所指控的逼供证词，抢在对警察的审理结束前，下达了定罪裁决。

94. 在法院诉讼期间，允许警察继续执行勤务。法院也没有要求警官们出庭听取对他们的审理，并且接受了警方的辩解理由，同意按照片，而不让涉案警察到场，接受对被告警察进行指认，其论据是从事反恐怖主义工作的警官身份应得到保护。因有关酷刑的体检证据不足，这些警官于 1998 年 3 月 11 日得到无罪开释。

95. 对于学生的定罪和对警察的无罪开释均提出了上诉。对学生定罪的抗诉仍有待裁定，但上诉法院于 1998 年 10 月推翻了对警察无罪开释的裁决，指出这些学生曾遭到身体和心理上的暴行。目前，一审法院必须重审警察案。

96. 对于警察和宪警也无充分的纪律管束，极少有警官或宪警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其实，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一些实例证实已查明犯有酷刑和虐待行为的警察实际上还得到晋升。同时，在调查期间，也极少有任何警察被停职，检查官提出起诉以后，也从未对警官实行监押候审。特别报告员得到的统计数字再次表明警官或宪警受到纪律制裁是多么少有的情况。

97. 例如，宪警中将 CetinHaspisiren 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过去五年来宪警就酷刑或虐待罪行展开内部调查的全国统计数字：关于酷刑行为，目前正在对 4 名警员和 7 名专业警官进行行政起诉；对于虐待行为，目前正在对 8 名警官和 60 名警员和 42 名专业警官进行行政起诉。

98. 代理安全局局长提供了下列有关警官的统计。在 1998 年的前十个月期间，由于行政处罚的结果，终止了 124 名警官的合同，其中只有 20 个案件涉及滥用职权（这 20 个案件并非全都与酷刑和虐待行为相关）；319 名警官被罚款或扣减薪金；179 名警官被停止晋级；98 名短期内不得晋级。

四、结论和建议

99. 特别报告员感谢土耳其政府对他发出走访该国的邀请，感谢与他会晤的各位部长、高级法官和许多公共官员同他合作，为他的走访提供方便并且提供了广泛的资料，使他能够在联合国限定文件篇幅的情况下，于本报告中尽可能广泛地反映出上述国情。若在该国内能有更充裕的时间以便走访地方，就更加理想了，应当可对国情作出更全面的评估。他还感谢各类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律师和医生等行业性机构，以及往往在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人权组织所给予的合作。与他会谈的许多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均向他提供了他无法走访的该国一些地区的情况资料。

100. 土耳其与位于政局不稳定之区域的七个国家接壤，难免受到该区域空前动荡的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的波及。土耳其西部比较发达，但仍大有发展余地，东南部更是大有发展余地。在库尔德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长期的不满情绪，是由于遭忽视、被歧视以及在文化与社会上受到压制所致，形成了对分裂主义和自治观点的雄厚支持力量，四处创建起的“库尔德工人党”于 1984 年发起了反对中央政府权力的暴烈反抗运动，包括在土耳其境内外杀害被认为敌视该组织目标的平民百姓。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广泛受到了应有的谴责。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在意大利骤然遭到逮捕之前，政府高级官员即已在特别报告员走访期间示意，他们已经大幅度地削弱了库尔德工人党实施其武装战略的能力，这种紧急状况结束在即。土耳其还面临着重大的毒品贩运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有组织的犯罪现象。

101. 因此，警察和其它治安部队不得不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往往不得不对付一些顽固不化的被拘留者，这种举措对专业纪律形成了尖锐的挑战。然而，与特别报告员交谈过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认为，采用酷刑和虐待的方式是铲除该国犯罪问题的合法手段。无论按土耳其法律，还是按国际法，酷刑和虐待都是犯罪行为。

102. 在特别报告员所会晤的各方人士中，对酷刑及类似的虐待行为的发生频率，在看法上差距甚大。许多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坚持认为，局面根本没有改观。他们认为，酷刑行为是普遍而且是一贯进行的，近来对法律作出的任何修改，只不过是“妆点门面”而已。为此，特别报告员指出，此处上下文中所用的“一贯”一词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作法得到最高政治上层认可，倘若不是预期的行为，也是可予以容忍的；第二、执法机构为开展调查、提取口供和恐吓的目的，普遍采用这种手法，不论是否得到国家公务部门上级或者政府政治领导层的认可；⁴第三、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采用的酷刑手法，都是蓄意搞跨被拘留者的意志。

103. 当局宣称，这几年来，特别是自从采取了在不提供法律咨询或不提交法庭的情况下实行较短期拘留的作法以来，情况有了相当的改观(由此，默认了以前情况的严重性)。同特别报告员交谈过的人却认为，这种现象目前仅限于个别案件，一定没有得到官方批准。

104. 特别报告员认为，现实情况与上述两种说法均不相符。基于他在这几年来收集到的广泛资料，他确切认为，直至并且包括 1990 年代上半期以来，当局大规模地一贯实施了包含上述一切含义的各种酷刑。禁止酷刑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的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得出的权威性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看法。然而，他认为过去两年来有了显著的改善。

105. 第一、大体上遵守了对单独监禁规定的新限期，从而限制了可能实施虐待的时间，也减少了可掩盖虐待情事的明显创伤的愈合时间。然而，有充分的资料

⁴ 对此，特别报告员指出并赞同反对酷刑委员会的下列定义：“委员会认为，如果据报的酷刑案件不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或时间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常、普遍和蓄意地至少在有关国家许多地区发生的，即表示存在着一贯的酷刑做法”(A/48/44/Add.1 号文件第 39 段)。

表明：一些执法官员不将犯罪嫌疑人直接送交羁押而擅自予以扣押、施行酷刑或加以虐待，这种作法并不是偶然性的行为。

106. 第二、与上条可能相关的是，某些地方所采用的残酷迫害手段已大为减少。在该国安卡拉和迪亚巴基尔以及另一些地区，施用 *falaka*(抽打脚掌)、“巴勒斯坦悬吊法”(双手反绑，身体悬吊于空中)、电棍电击和强奸等指控的件数，已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对被拘留者及其家庭亲属采取蒙住双眼、用橡皮管喷灌冰水、“直吊法”(绑往举过肩头的双手，悬吊在横梁上)、粗暴的体罚、性虐待和强奸的威胁、恶语辱骂以及对生命和身体健全的威胁等作法，在全国许多地区仍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对任何被怀疑与(广义的)恐怖主义罪行有牵连的人和涉及或被认为涉及有两名以上案犯的普通罪行的人，仍可延长单独监禁的期间，上述各种类型的虐待情况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与毒品有关的罪行。另一方面，某些地区仍在发生上述一些最恶劣的作法。

107. 上述情况改观的重大程度已使特别报告员认定，不能把仍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政策。他确实倾向于把官方频频重申的关于要在执法和司法方面达到欧洲和国际标准的承诺视为其真正政治意向的体现。在这方面，政府于他走访之后发出通告表示同意于1999年1月发表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他对此表示欢迎。换言之，他不认为这些酷刑属于上述三种含义中第一类的一贯行为。然而，全国许多地区的酷刑作法完全应该划定为具有上述第二项含义的行为，考虑到这些行为即使不算极端严重的酷刑行为也是上文段落所述的酷刑或虐待的严重形式，那就更加可以这样划定了。至于第三类所采用的“一贯”一词，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用法太易造成措词上的误解，因为任何涉及虐待的事件，都可划入这一范畴。另一方面，鉴于指控案件的地理分布、潜在受害者的范围，以及走访前后收集到大量证据，都不得不使人认定，不论采取何种搭配方式，上一段中所述酷刑作法仍然甚为普遍。在诸如不涉及两个以上案犯的普通罪行而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凡是能够立即得到法律咨询并遵守24小时拘留时限之前提交司法调查的，提出指控的范围和严重程度即会大为递减。在此种情况下所采取的作法不能定性为一贯的行为，也没有资料表明这是与适用较长羁押期限之情况一样普遍的作法。但必须提醒注意的是，可实行较长期单独监禁的那一类罪行具有相当程度的伸缩性，足以使执

法机构和听命于当局的检查官对他们认为必须优先审理的大部分案件采取较长期单独监禁的作法。

108. 特别报告员清楚地认识到，单独监禁期与就酷刑和虐待提出的严重指控及其可信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关系。几年来单独监禁期确已显著缩短，从(紧急区域内的)最长期限 30 天压缩至 15 天，再压缩为目前的 10 天。目前确实必须在四天之后送交法官，然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司法方面愿意在无须被拘留者到场的情况下将拘留期延长三天。正如若干高级检查官所承认的，倘若不是所有的，也可说有许多检查官认可延长 48 小时至 4 天的拘留期，而且不出面过问被拘留者的处境如何，或对警方延长拘留期的要求进行实质性的详细审查。

109. 与特别报告员交谈的检查部门人员对他说，警方觉得新的限期太短(警方人员在交谈时未向他抱怨，这是可以理解的)，通常认为这种维护目前限期的方式是为了符合国际和欧洲标准。因此，特别报告员意识到，若进一步缩短警方的拘留期有可能遇到执法机构的强力抵制。然而，他确信，必须缩减拘留期，使土耳其的作法达到(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人权委员会案例法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所体现的)国际标准和(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法所体现的)欧洲标准。事实上，许多警察和检查当局坚称大部分酷刑和虐待的指控系属诬告，那么，缩短拘留期将可使得关于遭受酷刑和虐待的诬告更加难以令人置信。

110. 在为数不多因酷刑或虐待行为遭到起诉的执法人员中，最终被定罪并被判处相对较短刑期的极少，虽对执法官员不受惩罚的风气有些冲击，但不足以完全驱散这种不正之风。许多人员在长期涉讼的过程中仍然继续供职，这个事实只能被他们本人、其同事和广大公众理解为在体制上得到大力支持的实证。宪警司令和警察局长无法下令对执法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内部纪律检查而须由内务部的官员和检查官来进行外部检查，这个事实的确表明权力当局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缺陷。

111. 在押人员在离开警方拘留处以及抵达羁押候审监狱时加强体检必然会影
响酷刑和虐待指控的性质和实质。然而，还得做相当多的工作来确保从事体检的医务人员具备充实的资格和独立性、医务人员以及接受体检的被拘留者不受恐吓、开具的体检证书不遭篡改或毁损，而检查官和法官们也能够适当重视具有独立性而且往往比较优秀的医生所开具的证明。

112. 如上所述, 走访集中探讨的是典型状态下的酷刑行为, 主要查访为了调查实行拘留期间施行的酷刑。探讨没有把重点放在监狱条件和典狱人员的虐待行为, 也没有着重探讨与查访的任务潜在相关的另一些问题, 例如对强奸案进行处女检验的问题(参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结论意见(A/52/38/Rev.1 号文件第 178 段))。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提请特别报告员关注此类问题而是他鉴于走访的时间有限, 认为只能优先顾及历来所收到的大部分指控所涉及之领域的问题。

113. 根据上述结论, 特别报告员提出了若干建议, 其中许多是与他交谈过的官员和其他人员请他提出的建议; 当然, 若干建议已经在政府和立法机构中引起讨论和辩论。人权事务高级协调委员会在主管人权事务国务部长、教授、 SamiTürk 博士的主持下开展了生气蓬勃的工作, 这些建议往往是从中得到启发的:

- (a) 修订法规以确保被拘留者均能按适用于普通罪行的法律立即与所选择的律师见面, 甚至在必要时另外聘请具有独立性的律师。
- (b) 修订法规以确保在被拘留者本人面见法官的情况下才可由法官命令警方延长羁押; 羁押期的延长, 从逮捕即日算起, 总共不得超过四天, 或在真正紧急情况下, 总共为七天, 但必须遵守上述建议中所述及的保障措施。
- (c) 目前在警察和宪警讯问时自动录制录音带和录相带的试验性项目, 应迅速推广到全国每个羁押所进行的这一类讯问。
- (d) 在押入警察、宪警、法院和监狱机构或从警察和/宪警机构获释时对被拘留者进行体检的医务人员应当独立于主管执法事务的部委或司法机构并具备法医检验技术, 有能力判定生理酷刑或虐待以及因精神酷刑和虐待遗留下的心理创伤; 应该给予国际援助以便进行必要的培训。在(涉及遭酷刑的拘留者或被控实施酷刑和虐待的官员的)任何法院诉讼程序中, 对由被拘留者选择的医生开具的体检结果应当与官方雇用或选择的、具备同等资格的医生所开具的体检结果一样, 得到同等份量的考虑; 解送某一被拘留者前往接受体检的警察不应参与对被拘留者逮捕或审讯或参与调查引起拘留的事件。体检期间, 警官不得在场。必须制订协助法医进行体检的顺序表以确保对被拘留者进行全面的体检。体检不应在国家安全法院的设施内进行。体检证明书绝对不可交

给警察或仍在警方羁押之下的被拘留者，然而，一旦被拘留者从警方获释之后，应立即将体检证明书交给本人及其律师。

- (e) 检查官和法官不得要求被拘留者出示曾遭受人身酷刑或虐待(尤其不得要求拿出案犯已被定罪)的确凿证据才决定不依据据称靠逼供所得的供述或材料对被拘留者进行起诉；当然，国家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以证明不曾逼供。此外，只要羁押期不符合上述(a)和(b)款所述的标准，这项规定应该也适用于对被控犯有酷刑或虐待行为者提起的诉讼程序。
- (f) 检查官和法官应认真调查被拘留者提出的一切酷刑指控。就国家治安法院的检查官而论，也应该将这些指控提请公共检查官展开刑事调查。检查官应亲自对指控进行调查，并应为此目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 (g) 检查官和司法机构应加快处置对被控犯有酷刑或虐待行为的公务员的审判及其上诉。所判徒刑应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相称，并应撤除《起诉公务员法》所提供的免诉保护。
- (h) 任何因实施或协助实施酷刑或虐待而被起诉的公务员，一律应予停职。
- (i) 警察和宪警当局应建立对其警员行为实行内部监督和纪律管制的有效程序，主要着眼于杜绝酷刑和虐待行为。
- (j) 绝对禁止警察在实行拘留时采取蒙住被拘留者双眼的作法。
- (k) 鉴于至少直至 1996 年极为普遍的作法，应当设置一个其诚信程度无可争议的独立机构，对据称主要由于拷打成招而被判定有罪者的一切案件进行复查。所有警官，包括最资深的警官，凡被查明曾经以直接还是默许的方式卷入酷刑行为者，一律予以开除并绳之以法；对酷刑行为证据采取串通或视而不见作法的检查官和法官也应该适用同样的处置办法；被受害者应得到确实的赔偿。
- (l) 应尽快设立由社区中受人尊重的成员、法律和传媒专业组织代表以及人权组织推举的人士组成的一个独立机构，走访并公开报道任何剥夺自由地点的情况。

- (m) 政府应认真地考虑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该国派驻人员, 遵守红十字委员会为探访拘留处所确立的一切标准, 彻底落实探访所有拘留处所的制度;
- (n) 鉴于有许多人投诉,指称被拘留者见不到辩护律师、检查官和法官未能切实调查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国家治安法院存在着一些违反程序现象以及法院的组成问题, 政府应当认真考虑邀请法官和律师独立问题特别报告员前往查访;
- (o) 同样, 鉴于根据反恐怖法经常拘留的一些人似乎只是行使了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政府也不妨认真考虑邀请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前往查访。

Annex

ALLEGATIONS SUBMITTED TO THE SPECIAL RAPORTEUR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ETWEEN 12 OCTOBER AND 12 DECEMBER 1998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1.	Cengiz Suslu	4 May 1998	Istanbul Police Public Security Section, Gayrettepe	Carrying an unlicensed weapon	11 May 1998: Anal rape with a truncheon, resulting in tearing of the intestines; electric shocks to the genitals; beatings. Underwent emergency operation at Sisli Etfal Hospital. Medical certificate stated that he could not work for 45 days.	No	Held for 20 days, but only last 4 days noted in custody log. Complaint made. Criminal proceedings initiated against 6 police officers.
2.	Mihriban Tomak (6); Asrin Yesiller (7); Sultan Tanrisevergil (6), Yagmur Tanrisevergi (8)	4 Jun. 1998	Istanbul Poli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3rd Section	Swindling; picking pockets	Shaving of children's hair; hosing with pressurized water while naked; <u>falaka</u> ; beating; threats. Medical report stated that they could not work for 7 days.	Not known	Complaint made. Result of Public Prosecutor's investigation pending.
3.	Aykut Yildiz (17 years old)	4 Jun. 1998	Kagithane and Beyoglu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Istanbul	Car theft	Kagithane: beating and kicking while naked. Beyoglu: beating with iron sticks, resulting in a broken arm. Medical certificate reported bruises to the face, shoulders and wrist, and broken left wrist.	Yes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4.	Serdar Sulun (17 years old)	31 Jul. 1998	Beyoglu Investigation Unit, Istanbul	Theft of car stereo	Suspension; electric shocks to the genitals; <u>falaka</u> ; sexual harassment; beating; threats; insults. Medical certificate reported bruises on left upper chest, left arm, right inside arm, upper left section of the back, centre back, right back and lower left knee; as well as bleeding from the genitals.	Yes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5.	Hakan Kizi (12 years old)	10 Aug. 1998	Mecidiyekoy Police Station, Istanbul	Unknown	Beatings. Medical certificate reported wounds to the head, bruises on the neck and right shoulder, a burn on the inside arm and deep bruises on both legs. It stated that the patient could not work for 10 days.	No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6.	Ergun Kose	12 Sep. 1998	Kidnapped from the street by plainclothes police	Attempt to make him become an informer	Blindfolded throughout; beating; left hand and wrist cut and a burning liquid poured into the cuts; insults.		Complaint made to Kartal Public Prosecutor. Result unknown.
7.	Gural Erdogan	2 Jun. 1998	Three different Beyoglu police stations	Theft	Beating; punching; squeezing ears; punching stomach; hitting head against the wall.	Yes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8.	Selim Ozcan	28 Apr. 1998	Eminonu Central police station, Istanbul	Carrying an unlicensed weapon	Beating; electric shocks; <u>falaka</u> ; sexual harassment; threats.	No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9.	Erdogan Yilmaz, Aysen Yilmaz, Arif Celebi, Zabit Ilitimur, Hasan Ozan, Necati Abay, Suleyman Yeter, Erdogan Ber, Bayram Namaz, Sultan Arikan, Gonul Karagoz, Ferhat Akcay, Sedat Senoglu, Mukaddes Celik, Birsen Kaya	21 Feb. 1997 to 6 Mar. 1997	Istanbul Security Directorate, Anti-Terror Unit	Political	Palestinian hanging; straight hanging; rape; beating; subjecting to cold air; dousing with cold water while naked; hitting genitals; attempted rape with truncheons.	Not known	Complaint made. Investigation ongoing.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10.	Murat Ekti	Death reported 24 Apr. 1998	Hatay E-Type closed prison	Serving conviction for theft	Reason for death unknown, but medical certificate reports bloody wounds on right shoulder and right back, and a broken spine. Autopsy requested.		Death reported to Adana State Prosecutor on 24 Apr. 1998 - body sent for autopsy, result unknown.
11.	Mehmet Yavuz	13 Mar. 1998	Adana police station	Theft	Dead on arrival at hospital on 14 Mar. 1998. Autopsy report records internal bleeding and stomach trauma, and large reddish bruises on both lips, shoulders, right and left armpit, right arm, left elbow, and sole of left foot.		
12.	Munsif Cetin	Aug. 1996	Rapid Deployment Forces, Diyarbakir				
13.	Sadik Kelekci	10 Mar. 1998	State Security Forces, Diyarbakir	Political	Beatings	Not known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14.	Abdurrahman Celik	16 May 1998	Batman Anti-terror Department	Political	Blindfolding; left standing naked and subjected to cold pressurized water; electric shocks; squeezing of testicles; suspension; beating; withholding food, water and toilet facilities; small dark cell; threats; insults.	No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Medical certificate prepared in police presence.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15.	Fatma Tokmak, female, and her son Azat Tokmak (2½ years old)	9 Dec. 1997 to 20 Dec. 1997	Arrest by Istanbul Anti-terror police, detention at Aksaray Anti-terror Department	Political	Fatma Tokmak: left naked; suspension; squeezing breasts; threats of rape; forced to watch ill-treatment of son; forced to assume sexual position with son. Azat Tokmak: electric shocks to the back; putting out cigarettes on his body. Medical certificate reported burns on his left back consistent with such treatment, and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Not known	Complaint made. Case initially dropped, but High Court decided to expand the investigation on appeal.
16.	Ozgur Acipinar	3 Nov. 1998	Plainclothes police belonging to Ankara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Anti-terror Branch	Political	Abducted in a car and taken to a remote field. Beaten over an 8-hour period. Threats.	No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17.	Orhan Demir, Nuriye Demir, Ismail Demir	15 Oct. 1998	Gazi police station, Ankara	Unknown	Beatings. Medical certificates reported: Nuriye Demir: soft tissue bruise on front right arm. Orhan Demir: Soft tissue trauma to right wrist; no work for 3 days.	No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18.	Deniz Celik (14 years old)	29 Jul. 1998	Batikent police station, Ankara	Theft of car stereo	Beating, left to stand naked while doused in cold water. Medical certificate reported bruising and oedema to the left eye and bruises behind the left ear and on the back.	No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19.	37 persons present at Saturday Mothers demonstration	15 Aug. 1998	Beyoglu police station	Political	Left in locked bus for over half an hour in the sun; sprayed with pepper gas during arrest; kept 12 or 13 in windowless cells 6m², withholding of toilet facilities.	Yes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20.	Nese Koker, Esra Akkaya, Tomris Ozden, Seda Berzeg, all female	29 Aug. 1998 to 1 Sep. 1998	Istanbul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Political	Left in locked bus for over half an hour in the sun; sprayed with pepper gas during arrest; kept 12 or 13 in windowless cells 6m ² ; withholding of toilet facilities.	No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21.	Atilla Asici, Tulin Yilmaz	26 Sep. 1998	Beyoglu police station	Political	Left in locked bus for over half an hour in the sun; sprayed with pepper gas during arrest; kept 12 or 13 in windowless cells 6m ² ; withholding of toilet facilities.	Yes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22.	Emine Ocak, Husniye Acar, Cafer Ocak, Mahmet Gulveren, Muteber Yildirim, Adil Firat, Ozlem Temel, Nese Ozan Toker	24 Oct. 1998	Beyoglu police station, Anti-terror unit	Political	Left in locked bus for over half an hour in the sun; sprayed with pepper gas during arrest; kept 12 or 13 in windowless cells 6m ² ; withholding of toilet facilities.	Yes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23.	Sukran Esen, female	Nov. 1993 and Mar. 1994	Derik Caykoyu and Mazidagi Gonarkoy, Gendarme station personnel, Mardin		Repeated rape on each occasion; electric shocks and <u>falaka</u> in Nov. 1993.	Yes	Complaint made on 23 Jul. 1998, but rejected on 28 Sep. 1998. Currently on appeal.
24.	Emine Yasar (16 years old), female	1 Oct. 1995 to 16 Oct. 1995	Istanbul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Anti-terror Branch	Political	Hitting head against the wall; electric shocks to foot and fingers; anal rape with a truncheon on three occasions; forced to witness rape of another woman; threats. Underwent operation for torn rectum following release in 1997.	No	Found guilty and imprisoned until 1997. Complaint for torture made upon release. Result unknown.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25.	Remziye Dinc (17 years old), female	Jan.-Feb. 1995	Village guard, Sican Village, Kozluk, Batman		Raped while threatened with firearm that she would be revealed as PKK member. Gave birth to child as a result, shown to be child of the village guard.		Complaint made. Village guard acquitted on ground that sex was consensual. High Court returned case to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n grounds that it was statutory rape. Case pending.
26.	Okan Kablan (now 18 years old)	7 Feb. 1996	Istanbul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Political	Beatings; Palestinian hanging; subsection to pressurized cold water; blindfolding; obliged to sign confession.	Not known	Held on remand for 22 months. Released in Nov. 1997. Trial still pending. Claim filed against police. Results unknown.
27.	Deyrim Öktem, female	5 Feb. 1996	Istanbul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Political	6-17 Feb. 1996: forced to strip, doused in cold water and placed in front of a fan with the window open; straight suspension; threats to make her miscarry (she was 1½ months pregnant at the time); squeezing of breasts; hitting breasts and rape with plastic stick; <u>falaka</u> ; beating on stomach and back for 1½ hours, causing subsequent miscarriage.	No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28.	Sevgi Kaya (15 years old), female	8 Feb. 1996	Istanbul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Political	Blindfolded; beatings, including with truncheons; subjected to loud music; threats of rape; soaked with cold water; dragged by the hair; forced to strip naked; <u>falaka</u> ; death threats; squeezing of breasts; suspension; cold water thrown on kidney area and exposed to fan, resulting in kidney infection; beating on hands.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29.	Gulderen Buran, female	4 Aug. 1995	Istanbul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Political	Severe beating causing gynaecological bleeding; sexual assault in car while being transported to Security Directorate; kicking and punching; blindfolded; suspension, including in the form of a crucifix, with her hands tied behind her back, and with heavy stones tied to her feet; beating on kidneys; spraying with pressurized water; sexual harassment; death threats and other forms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She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extreme weakness of the right arm, and weakness of the left arm.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on basis of single testimony by policeman, but decision overturned by High Court and returned to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urrently on remand in Bayrampasa.
30.	Ayfer Ercan, female	26 Jul. 1995	Istanbul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Political	Beaten and sexually assaulted by police while being transferred to the Security Directorate. Dragged by the hair; suspended with hands tied behind her back and attached to a wooden bar; blindfolded throughout; mock execution; threatened with rape; stripped naked and forced to lie on ice, then sprayed with cold pressurized water and forced to stand in front of a fan; repeated beatings throughout detention; electric shocks; forced to sign a confession.		Currently in Bayrampasa prison. Needs regular medical treatment, but is subjected to threats and beatings each time she is transferred to hospital.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31.	Ahmet Fazil Tamer	19 Apr. 1994	Gayrettepe Security Directorate, Istanbul	Political	"Palestinian hanging"; squeezing of testicles; spraying with cold pressurized water; beatings.		Police forged signature on the confession as he could not move his arms as a result of the suspension. Public Prosecutor used his fingerprint as victim could not use his arms. Still on remand in Bayrampasa prison, and proceedings ongoing to prove that the signature on the statement was not his.
32.	Emine Babacors, Nehir Bagdur, both 13 years old	8 Jan. 1998	Manisa Security Directorate	Theft	Beatings; sexual harassment with hands and truncheons; threats of rape; insults.	Not known	Complaint lodged with public prosecutor. Result unknown.
33.	Hamit Dogan	19 Jan. 1998	Izmir police officers	Attempt to force him to be an informer	Blindfolded and handcuffed and taken to unknown building; electric shocks to genitals and toes; suspension.		Official complaint made. Result unknown.
34.	Mehmet Sahin Karakaya	21 Jan. 1998	Kucukcekmece Security Directorate, Istanbul	Robbery	Stripped naked; <u>falaka</u> ; threats. Medical certificate reported unable to work for 3 days.	Not known	Official complaint lodged against police officers.
35.	Ali Kartal, deaf and dumb	Apr. 1998	Police from Bozyaka station, Izmir	Political	Electric shocks; beatings resulting in two broken teeth; threats.	Not known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36.	Oktay Berke	17 Jun. 1998	Bozyaka Security Directorate, Izmir, including Can Gokalp, police chief	Attempt to force him to become an informer	Taken blindfolded to a swamp area and threatened with being thrown in; beaten with truncheons by 7 officers. Medical certificate stated could not work for 7 days.		Lodged official complaint against officers.
37.	Bülent Özpolat	9 Oct. 1996	Istanbul Anti-terror	Selling newspaper of political nature	Blindfolded; stripped naked; squeezing of genitals; slapping until his chin was broken.	No	Kept for 3 days in custody and then released after signing a paper that he was not beaten. Operated the day after his release for the broken chin. Complaint to public prosecutor, investigation still pending.
38.	Nevruz Koç	1 Jan. 1997	Sarıyer police station	Insulted, started a fight and punched a policeman	Blindfolded, hit, slapped.	Yes	Operation on one leg as consequence of beating. Applied to prosecutor as he knew one of the torture perpetrators and had strong medical report. Also threatened.

	Alleged victim(s)	Date of arrest	Alleged perpetrators	Charge	Description of treatment and/or injuries	Access to a lawyer	Other
39.	Cemir Doğan	6 Nov. 1998	Police Aksaray police headquarters	Participated in manifestation against High Board of Education	Beaten, blindfolded, "Palestinian hanging" for two minutes, stripped naked, hosed with pressurized cold water. Same procedure the following day.	No	Released by State Security Court, detained again because he had not done his military service.
40.	Mehmet Ali Damir	1 Jan. 1998	Şehreñhr police station	Fight at the market	Beaten, slapped on the ear, his head knocked against the wall, rape threats.		One-day detention. No medical examination. Released by court. Complained of torture to prosecutor. Forensic report proved damage to ear.
41.	Şukriye Çınar and Zeynep Çalıhan	End Oct./ beginning Nov. 1998	Beyoğlu police station	Demonstration at ANAP (Motherland Party) headquarters	Stripped naked; beaten; verbal assaults; head hit against the wall; touching of genitals with stick; kicked; kept with no food for two days.	Yes	Visit to forensic doctor with door open. Claim to prosecutor who said he had medical reports. Set free by court.
